

浸大「佔領」事件背後政治組織的圖謀

浸大「佔領」事件早有預謀，背後有政治組織和激進學生干擾院校自主，並且有借助反普通話推動「文化港獨」的圖謀，企圖一刀切斷港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要從香港青年學生的頭腦裡徹底抹掉中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印記。對於這種「文化港獨」，必須高度警惕。

黎子珍

浸會大學10多名學生早前「佔領」語文中心，威嚇教職員。事件中的兩名搞手劉子頌、陳樂行已被校方勒令停學，直至學生紀律委員會完成調查。校方有根有據的決定，卻引來多名激進分子「幫兇」無理仇視及攻擊。港大、中大、城大「民主牆」先後出現粗口辱罵浸大校長錢大康標語；浸大校園周邊亦發現多處刑罰，遭人噴塗「不要普通話」等字句。

背後有政治組織和激進學生操控

新爆出的視頻顯示，浸大高級講師陳士齊，當時在「佔領」現場，多次阻止保安進入語文中心維持秩序。陳士齊早前曾多次公開批評浸大的普通話考試政策，他曾是香港激進組織「社民連」的創辦成員之一。

「港獨」組織「熱血公民」主席、倒插國旗和區旗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鄭松泰，也是浸大「佔領」事件的幕後黑手。鄭松泰第一時間在臉書大肆煽動學生，更「引導」他們去香港平機會投訴。在他的「鼓勵」之下，浸大學生會更加有恃無恐地將事件升級。

被校方勒令停學的兩名激進學生，過往言行均曾明確支持「港獨」。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劉子頌在開學禮向新生致辭時公然「播獨」，呼籲以「台獨」暴徒鄭南榕為榜樣，慫恿新生所謂「守護香港」；劉子頌又與大搞

校園「播獨」的「香港民族黨」關係千絲萬縷，例如去年七月「香港民族黨」因主張「港獨」而被警方禁止舉行集會，劉子頌當日亦有份參與，並被警員在尖沙咀截停問話。

中醫學及生物醫學系五年級生陳樂行是反普通話團體「港語學」召集人，長期參與、策劃「港獨」、「反中反普」等活動。去年九月，校園「港獨」事件不斷發酵之時，陳樂行在浸大「民主牆」上張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港獨」言論，10月初又再次發帖自認：「嗰日我貼咗張『港獨』海報。」陳樂行還曾與「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關係密切，去年七月一同出席反對任命蔡若蓮擔任教育局副局長的記者會。

劉子頌與陳樂行更與多個「本土派」人士聯繫密切，其中「社民連」創辦成員、浸大宗教及哲學系高級講師陳士齊在「佔領」前曾就普通話考試邀請陳樂行出席他的網台節目，隨後便在「佔領」過程中親自為學生「把風」。

「佔領」事件早有預謀

顯然，浸大「佔領」事件早有預謀，背後有政治組織和激進學生干擾院校自主，並且有借助反普通話推動「文化港獨」的圖謀。「佔領」事件由浸大普通話考試引起，少數激進學生視普通話教學為「洗腦」、「蘇

共」，公開宣傳香港學生不要普通話。「佔領」事件發生後，當年傾力支持及呼籲基督徒參加非法「佔中」行動的浸大文學院副院長羅秉祥撰文，呼籲校方取消普通話合格才能畢業的要求，羅秉祥的「理據」是，同學對普通話有偏見，源自他們對「中央政府的討厭」云云。這位「佔中教授」仇視普通話的歪理，揭開浸大風波本質是「文化港獨」的底牌。

根據浸大「校方資料」，於2007至2016年的十年間，只有5人因普通話不合格而被拖延畢業。數字證明，在浸大，即使十年來外邊風風雨雨，也無礙普通話學習的勢頭。因此根本不是大部分浸大學生反對學習普通話，而是背後有政治組織和少數激進學生干擾院校自主，令所謂反普通話成為校園「播獨」議題。

浸大「佔領」事件背後政治組織和激進學生的圖謀，是借反普通話推動「文化港獨」。實際上，故意借助簡繁體字、普通話粵語之爭推動「文化港獨」，是激進反對派和「港獨」勢力一直倒行逆施的行為，這方面公民黨毛孟靜、新民主同盟范國威、「熱血公民」鄭錦滿早有前科。這次浸大「佔領」事件背後政治組織的圖謀，是企圖一刀切斷港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要從香港青年學生的頭腦裡徹底抹掉中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印記。對於這種「文化港獨」，必須高度警惕。

通過臨時撥款 特朗普困局難改

許楨 資深評論員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美國國家檔案館大樓前擺放著關門通知。

中。就在入主白宮滿一周年之際，特朗普的民望遠不及之前三任美國總統；與此同時，其黨內外的對手，亦不見得因為聯邦政府停擺而獲利。

政壇相爭、民間相分的局面，隨着稅改、新移民法的實施而惡化下去。客觀上講，特朗普遣返拉美非法勞工及其第二代的去向，也有一定的法律及民意基礎；自墨西哥闖入美國南部的「尋夢者」，已對邊界以北各洲的安寧和就業，造成一定壓力。然則，除卻施政出發點的合理性、合法性，如何透過符合分寸的執法手段來爭取民意、民情，也是21世紀政治家的必由之路。

在這方面，令美國各階層民眾「情何以堪」，似乎就是特朗普及其團隊的看家本領。稅改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自老布什至奧巴馬，就屢次調控稅率、稅種；一般來說，只有加稅會招致民眾不滿。讓人稱奇的是，特朗普即使大幅減稅，也讓大部分民眾抗拒相關改革。說明其大張旗鼓，讓跨國企業賺更多錢的主張，在情感上難以爭取主流民眾的支持。意料之內、情理之外，成為特朗普施政的招牌菜。

事實上，隨着美聯儲加息、美元走強，特朗普以調減利得稅來平衡美國企業的成本劣勢，其背後也有清晰的政策邏輯；以蘋果公司為代表，數以億、兆美元計的資金，無論是來自美國企業海外部分，還是國際投資者，都會促進該國金融業、各類投資市場，以及實體經濟的發展。起碼在中短期之內，美國經濟增長，不會比特朗普上任之初慢。

以此為背景，今年底的國會改選，就更加值得注意。在黨友執掌國會的情況下，特朗普成為首位遭受政府停擺的美國總統。在此之後，該位惹火的白宮主人，又會否成為極少數任內經濟向好，卻失去國會控制權的總統？由班農協助國會、國安部門調查「通俄門」，又會否成為牆倒眾人推的關鍵？由外到內再到外，轉了地球一圈，特朗普真的沒幾個朋友。

勸大狀小朋友莫再玩法律泥沙了

黃熾華

《文匯報》1月25日的論壇版刊登了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題為《戴啟思主席不代表我》的文章，文章寫得很好！是的，當選主席的戴啟思在1,400選民中只得620票即未及半數（僅44%），怎能代表香港全部大律師呢？號稱「人權大狀」、曾多次代表反對派人士打官司的戴啟思表示，他之前有數次與中央人士有交流，「關係」不錯云云；而當選執委的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在港台表示：做大律師不能「揀客」，也不擔心戴氏與中央交流、溝通，因為他相信內地當權者不是「小朋友玩泥沙」。戴、陳的言論除了自我感覺「良好」，更夜郎自大放肆地將自己當「大人」，誣衊中央領導是「小朋友」，若不依洋大狀的法律解釋就是「玩泥沙」。但事實證明，將法律當泥沙玩的正是大律師公會中的某些「御用」大律師，真是賊喊捉賊！

證據之一，戴啟思曾為被DQ的梁仲恆、游蕙禎當辯護律師，亦即無視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替梁、游的分裂中國、鼓吹「港獨」言行辯護，玩弄法律，結果失敗了；他還曾替老太婆盧少蘭挑戰「領匯」（今領展）上市，阻止一間公司發展，繼續失敗；公民黨某洋大狀教東涌朱婆婆打港珠澳大橋施工「司法覆核」，妄圖阻撓香港乘搭國家經濟飛躍快車，也失敗了；2014年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人鼓吹「違法建義」煽惑青年學生違法「佔中」，當時有不少「御用律師」坐場支持違法，又失敗了。

證據之二，就是某些「御用」大狀不尊重中國憲法，與中央、全中國人民唱對台戲。憲法對全黨全國人民、特別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都有重大和特殊的現實意義，我們堅決擁護、支持！可是，大律師公會某些頭頭卻將普通法凌駕於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之上。洋律師時至今日仍不知香港已回歸中國，實行

「一國兩制」乃國家憲法的規定，「兩制」是在遵守「一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原則下在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某洋大狀至今不識「一國」和憲法的「真面目」，只緣身在殖民主義夢幻的山中，故一廂情願要用普通法與國家憲法抗衡並「代替」香港基本法，這不是小孩在玩法律泥沙嗎？

對中國憲法認識如「小學雞」

證據之三，是他們對法律的刻舟求劍和膠柱鼓瑟。眾所周知：其一，他們奉為治港「圭臬」的「普通法」起自中世紀英格蘭制定的法律，至今已逾300多年，而香港已回歸中國20年，當然以國家憲法為根本和以基本法治港；其二，即便基本法第八條規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等予以保留，也只是為了照顧香港沿用的審判例法，絕非以普通法代替香港基本法和國家憲法。否則，普通法和基本法沒條文處理「港獨」，豈非就可以放任、姑息？何況，普通法可以保留，也是由基本法規定的；而基本法又是以全國最高憲法精神而制定，國家憲法是根、是源、是本，普通法是流、是支、是從，倒末為本，玩法律泥沙是何用心？

證據之四，某前律師公會主席否定人大常委會關於在高鐵西九站實行「一地兩檢」決定，誣為「缺乏法律基礎」。對中國憲法認識如「小學雞」，因為他不讀中國憲法。不知憲法第67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的21條憲制權力首1、2條就是「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和「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也不懂基本法第158條規定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基本法，故不理解人大常委會決定「一地兩檢」是一言九鼎的憲制決定。

大律師公會中某些人是法律的代表和「守護神」嗎？不，他們是法律「小學雞」。故我們奉勸洋大狀中的「小朋友」們別再玩「法律泥沙」了！

加公共服務收費需三思

柯創盛 立法會議員 香港群眾匯思主席



柯創盛

林鄭月娥特首上任至今，公佈了多項惠及經濟民生的政策措施，民望穩步向上，社會氣氛明顯好轉，對此，是值得我們肯定的。然而，筆者感到林鄭政府也有施政理念矛盾、政策措施前後不一貫的地方，同樣需要改善，一不小心，將會對現時的良好局面造成破壞。

記得林鄭月娥在競逐特首期間，曾表示港府已擁有充足財政儲備，必須善加利用，還富於民。故此，她提出了免審查的交通津貼，以及計劃將中小企繳交的利得稅稅率大幅調低等，也是為現屆政府贏得掌聲的政策措施。然而，既然林太也知道特區政府已坐擁巨額的財政儲備，遠超安全指標以上，根本不缺錢，又何必繼續調升或不在上任後阻止多項公共服務收費的加價呢？

大家不妨在Google搜索一下以下關鍵詞「2018、公共服務、加價」，便會發現有多項公共服務將於2018

年加價，包括郵費、電費、公屋租金、房屋署轄下停車場收費、西隧和大橋隧道收費、多條離島渡輪航線收費等。由於基層市民對公共服務最為依賴，故公共服務陸續加價，無疑對基層市民影響最大，百上加斤，也會使基層市民對港府感到失望。

筆者與很多市民一樣，不明白政府何以一邊嘴巴上慷慨，又減利得稅又推出交通津貼，表面上是要減輕市民的生活開支，舒緩基層市民的生活壓力，但另一方面又容許多項公共服務加價，使到小市民的財富流向政府，這豈非施政理念上的自打嘴巴嗎？既然特區政府坐擁巨額財政儲備，甚至有報道表示港府今年將再次錄得逾千億元的巨額盈餘，何不對公共服務作出更大補貼，即使未能減免收費，至少也應該凍結加幅？這一方面，林鄭政府是應該好好交代和檢討的。一個盈餘水浸的政府，真有必要增加公共服務的收費嗎？畢竟，現時相對平和的社會氣氛是得來不易的，新政府必須好好珍惜，多照顧市民感受，至少不要向基層市民抽刀，破壞得來不易的良好勢頭。

特區政府應支持港青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陳曉鋒 法學博士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城市智庫研究員



陳曉鋒

筆者上周和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90後探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事業的問題，我問他，「你做了學位認證沒有？做了學位認證在深創業可以享受留學生創業的相關補貼」。這位朋友聽到我說學位認證還是「一頭霧水」，根本不知道香港的學位回到內地還要認證，更加不知道申請認證後還可以享受留學生創業的相關補貼。

其實學位認證就是境外學位獲得者在內地升學、就業、申請科研基金等依據而針對留學回國人員開展的一項國外學歷學位鑒定工作。通過出具認證書的模式，來表示該學位獲得者的學歷以及就讀方式都是教育部認可的。學位認證的證明也是一種申請審核通過就可以獲得的認證。目前深圳提供的許多創業和發展方面的獎勵和補助大部分都非常青睞香港各大高校畢業的精英。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

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隨後不久，中央政府陸續公佈了多項便利港人在內地生活的措施，包括容許在內地工作的港澳居民向「住房公積金」供款，在內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港澳研究人員可以申請國家社科基金等。應該說，中央政府一直以最大的誠意和最大的努力為港人提供實實在在的優待和便利，對此，特區政府也應該為港人融入國家發展提供更多的支援和保障。

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首先是特區政府要支持香港青年融入祖國內地發展，為香港青年北上發展提供配套政策，尤其要擔當好「引路人」的角色，梳理好內地和香港有關青年發展的政策，如學業、創業等。對接好內地和香港有關青年發展的資源，如置業、事業等。

香港經濟發展成熟，土地資源稀缺，生活成本高昂，但香港青年面臨着樓價過高的問題導致難以置業，面臨創業成本過高的問題導致創業無門，如果特區政府願意從政策和資源上更多地引導年輕人到大灣區創業和置業，將可以更好地促進香港和內地融合，也可以幫助年輕人安居樂業。

浸大事件反映青少年教育問題值關注

李曉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

近日浸會大學學生「佔領」語文中心一事，鬧得整個香港都沸沸揚揚的。一方面這次「佔領」徹底的打破了一般人的道德底線，在「尊師重道」的文化傳統價值上，已經超越了政治上建制派和反對派的政治意識之爭，相信即使反對派人士有意偏頗，也難有分數可加。而另一方面，近年來香港深陷政治掙扎中，市民對政治議題的厭煩轉移到另一種對未來前程的焦慮：「這一代已經如此，下一代又將如何？」這種焦慮不僅僅反映了精英階層對下一代是否可以順利「世襲」成功，又反映了普通市民對下一代既愛疼少吃苦又想子女出人頭地之間的矛盾。

浸會大學學生的訴求明眼人已不用思索便知其荒謬，彷彿如小朋友一般不達目的便要發脾氣，如同巨嬰一般的看似有獨立思考，但邏輯卻幼稚可笑。考試不成，不想如何亡羊補牢、好好溫習，而是走向另一極端要求取消考試。那麼此等邏輯下，有朝一日是否上班做事不成，便要說老闆有問題，更極端一點認為：為何上班才有糧出，取消上班也可出糧才算合理？相信所有家長，無論文化高低都無法接受這樣的訴求，當自己的子女真如此要求，出於父母之愛可能會無條件的滿足給予。當然自己家裡的事情，我們外人無法過問，但是走向社會卻有此理？

我們常說「刀，割不了自己的把」，家長難道真的不知這樣教育子女會有問題？全然不知，相信也不大可能，但是多數也就得過且過，甚至近十年來常常出現的「直升機家長」、「怪獸家長」，說到底，就是對自己子女的一種溺愛。理大最近的調查顯示，超過九成市民認為自己的子女有樂於助人、善良的品質，但是也有將近四成家長認為香港一般青少年道德水平偏低和偏向物質主義，近半家長認為香港青少年的道德水平在下降和責任行為有待加強。這組數據所反映出的不僅僅是家長對香港青少年的憂慮，更顯示出家長一種普遍心態：「問題都出在別人」。

在一個又一個的青少年問題面前，我們是否應對青少年多一些深層次的反思，是否需要政府和社會有識之士，對青少年道德教育問題再多一些關注？尤其是那些不正之風，我們如何果斷地進行制止？試想一下，如果從來沒有出現過妥協，人們便不會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如此看來，在青少年價值觀方面，如何使他們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這不僅僅是學校和家長的事情，更是全社會共同的事情。面對浸大事件，我們這個社會，包括政府、企業、學校、家庭所有持份者，除了批評外，還應該告訴青年們一個事實，就是成功的出路只有一條：踏踏實實地做好每一件事。